

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權力鬥爭·上·

丁匡華

壹 毛劉的勾結與分裂

共匪內部的權力、派系鬥爭，可以說是與生俱來的。從匪黨於一九二一

年七月一日舉行第一次全國大會正式成立匪黨之日起，這種權力、派系的鬥爭，即已萌芽滋長。最初發生國際派與地方幹部的鬥爭。當「立三路線」時期，曾有匪黨江蘇省委書記何孟雄會首先發動「反立三路線」，引致匪黨地方幹部暗中進行反匪黨中央的祕密組織，成立「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號召匪黨員反對「四中全會」，反對國際代表米夫（Mif）。其地方基層組織參加者有滬、蘇、浙等省。匪黨國際派在蘇俄史達林的不斷支持下，李立三被黜，陳紹禹在保證徹底執行「國際路線」的情勢下登台，這是匪黨權力、派系鬥爭最著名的第一個回合。其次，國際派與毛匪的鬥爭。當國際派與地方幹部正在鬥爭劇烈的時候，毛匪却別具用心，在湘贛邊境深山，率領兩湖秋收暴動的殘餘四百多人，一再流竄至江西南部寧岡縣屬井岡山與土匪王佐袁文才股合夥，自稱「工農軍第一師」，過着打家劫舍的生涯。嗣後，朱匪德部又於一九二八年三月底到達井岡山與毛匪會合，編成「工農紅軍第四軍」，以朱匪為軍長，毛匪為「黨代表」兼任匪黨中央前敵委員會書記，在匪軍中建立匪黨的組織，羽毛漸豐，於一九三一年冬正式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毛匪對國際派陳紹禹的領導，乃逐漸展開鬥爭，並誘陳匪於一九三二年赴蘇區予以扣留，迫使陳匪離華赴蘇，並由秦匪邦憲繼任匪黨總書記。不久匪黨中央機關在滬迭遭摧毀，無法存在，乃祕密遷到瑞金。匪黨進入瑞金後，其權力則逐漸落入毛匪手中。這些史實都說明匪黨內部的權力、派系鬥

爭，一直在此起彼落，不住地向前發展。

毛劉的勾結與分裂，其演變亦完全是權力揉合與權力衝突，而形成的派系鬥爭。當其利害互相一致，權力便揉合，當其利害相衝突乃自我形成權力的衝突，這種情況，不難找到實例說明。

(一)合夥鬥倒秦邦憲 一九三三年政府對匪展開五次圍剿，匪乃於一九三四年十月初離巢，突圍西向流竄，於一九三五年一月經過貴州遵義時，匪黨中央政治局召開「遵義會議」，鬥倒當時匪黨領導人秦邦憲，並「糾正了一切與毛澤東正確戰略思想相反的錯誤思想，確立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毛匪的獨裁地位乃告正式確立。這時劉匪地位雖微，僅任匪紅三軍團的政治部主任，惟當時劉匪以與秦邦憲同為「二十八個標準布爾什維克」者之一份子而夥同毛匪倒秦，亦頗具影響力，因而益得毛匪之器重，於一九三五年抵達陝北後，不久派劉匪組織匪黨「北方局」，領導「白區」工作。

(二)鬥張國燾、陳紹禹 一九三六年十月，紅二方面軍任弼時、賀龍、紅四方面軍張國燾、徐向前等殘部先後到達陝北，與毛會合，次年陳紹禹亦由莫斯科返抵延安。南方的新四軍項英亦有「獨立」傾向。毛匪處處顧形複雜，劉少奇乃配合一、二方面軍實力派彭德懷、賀龍、林彪等人，先後鬥垮張國燾、陳紹禹，屈服了博古、徐向前，拉攏周恩來及留法系人物如聶榮臻等。皖南「新四軍」事變以後，劉匪又出任「新四軍」政治委員，替毛匪招撫了「新四軍」殘部。

(三)「整風」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毛匪夥同劉少奇推行「全黨整風」，以鞏固毛匪在匪黨的領導地位，並於一九四五年匪黨七大大會

將「毛澤東思想」列入匪黨黨章之內。

以上所舉事例，都是毛劉兩匪因利害一致相揉合的一面，至因利害相衝突，而由暗鬥至分裂，開始於一九五三年，在毛匪最早將擬肅清當時積極親俄派份子高崗、饒漱石等匪時，劉匪少奇即予表示反對。劉匪却非單純的反對整肅高崗、饒漱石，而且懼怕整肅高崗，引起蘇俄的反感。毛劉兩匪會就此事有所爭論。雖然未見透露爭論之實際情況，但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匪黨中央政治局會議，毛匪會呼籲：「加強黨內團結」，其用意即在暗示駁斥劉匪之主張。

翌年（一九五四）二月六日，匪黨召開七屆四中全會，毛匪避不出席。劉匪則在會中大放厥詞說：「一部份黨的高級幹部，因對集體領導之認識不夠，……乃抱有極端危險的傲慢心理，過份自我誇大，強調個人的威信壓倒一切，認為自己是天下第一人……」這些話顯然是針對毛匪而發。

一九五五年毛澤東與劉匪少奇因經濟政策路線，曾發生重大衝突，當毛匪推行匪偽「初級農業合作社」時，其基礎極不穩固，但毛匪倒行逆施，仍不顧一切的盲動推行，緊接着不久又改為「高級農業合作社」，劉少奇對此會以蘇俄失敗的先例，表示反對。是（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匪召開「匪黨省委、市委及區委會議」，即席發表「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其中有稱：「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羣衆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我們的某些同志却像一個小脚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裏走路，老是埋怨別人說：走快了，走快了，……一個要下馬，一個要上馬，表現了兩條路線的分歧」。這裏毛匪所講的「下馬」的「小脚女人」，指的就是劉匪少奇。

匪黨中央委員會下設有「中央書記處」，處理匪黨日常工作，這一機構，在匪黨「八大大會」以前，向由劉少奇負責。但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在匪黨中央政治局之下，突然設立了一個「中央秘書處」，并委鄧小平爲秘書長，以與劉少奇所領導的「中央書記處」分庭抗禮，迄一九五六年九月匪黨「八大大會」改組匪黨「中央機構」，劉匪改任匪黨「副主席」，「中央書記處」即交與鄧小平掌管，同時「中央秘書處」立即撤消，這顯然是毛匪剝奪劉匪黨權的潛在陰謀。

一九五六年九月，匪黨「八大大會」，劉匪爲打擊毛匪，在新「黨章」中，將舊黨章總綱「以馬克斯、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的統一

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爲自己工作的指針」一段，改爲「以馬克斯、列寧主義作爲自己行動的指南」，而將「毛澤東思想」字句刪除。并規定「任何黨員必須受到黨的自上而下的監督」；「不容許把個人放在黨的集體之上的行爲」，這顯然是劉匪給予毛匪莫大的打擊。

一九五七年春，毛匪受了匈牙利人民革命事件的刺激，突然掀起「鳴放運動」，高唱大鳴大放，企圖以「言論自由」來緩和大陸人民特別是知識份子反匪的情緒，但劉匪對此表示極不贊成，據「民盟」要角錢偉長透露：「鳴放搞不好，因爲劉少奇到彭真一線不主張鳴放」。

同（一九五七）年底，毛匪以匪黨「主席」和匪偽政權「主席」的身份，提出所謂「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口號，并隨即推動「大躍進」運動，大唱「異想便能天開」、「一天等於二十年」、「敢與天公比高低」、「十五年內趕上英國」等狂妄和不切實際的論調。當時，劉少奇看到毛匪如此狂妄，頗爲不滿，故於一九五八年五月，利用在匪黨「八屆二中全會」上作「工作報告」的機會，對毛匪發出攻擊，他說：「領導者必須把革命的熱情和實際的精神結合起來，……切忌空喊和虛誇，不要把實在沒有把握的東西輕易地作爲計劃宣佈」。毛匪對劉少奇的指責，非但沒有即時反省，而且在以後的幾個月中，更發動「全民煉鋼」和「人民公社」運動，搞得大陸匪區民怨沸騰，危機四伏。同年十一月，匪黨在武漢召開「八屆六中全會」，對毛匪的「人民公社」運動採取收縮政策，以挽救由毛匪之狂妄所造成的危機，并決定不再提名毛匪爲下屆匪偽政權「主席」，而由劉少奇取而代之。這雖沒有直接證據可以說明劉少奇會利用各方面的壓力奪取毛匪的權力，但匪黨「八屆六中全會」會後不久，劉匪在偽「農業先進生產者會議」上再度發表攻擊性的言論，他說：「衝天的幹勁，并不表現在只憑主觀願望所定出來的指標上，……任何浮誇的形式主義的作風，對於我們的事業只會造成損失」。這又是指名毛澤東而發。

一九五九年四月偽「二屆人代會第一次會議」，選舉劉少奇爲偽政權主席，使劉匪登上偽「國家元首」的寶座，是爲劉少奇的權力巔峯，毛匪雖以匪黨「主席」地位仍可指導政治，但究不如過去之得心應手，多少要受劉少奇牽制，殊使毛匪引爲不快，而毛劉之暗鬥，亦由茲導致分裂，進入了另一階段，釀成今日互相火拼的局面。

劉少奇升任偽政權主席後，爲求鞏固其政治地位和抬高他的聲望，在政策路線方面，自然有其個人的主張，特別是一九六〇年林彪通令匪軍「學習毛澤東思想」、高呼「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劉匪認爲這將是他的權力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暗礁。於是在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匪黨「建黨四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乃唱出反調，以期阻止和沖淡這一運動的發展。這一「講話」，對於「學習問題」方面，劉少奇認爲「現在全黨」需要展開「一個新的學習運動」。他要求匪黨黨員學習「馬列主義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基本原理」；學習「毛澤東同志根據馬列原理所闡明的我國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際問題」；學習「黨中央製定的各項政策」；學習「蘇聯和其他兄弟國家的建設經驗」等等，劉匪所云「新的學習運動」就是沖淡林彪所稱的「學習毛澤東思想」。劉匪要求黨員學習「馬列主義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基本原理」，無異是等於否定「毛澤東思想」。對於「領導問題」方面，劉少奇對於毛匪的左傾冒進政策斥爲與右傾一樣錯誤，他說：「右傾錯誤或者左傾錯誤，它們的共同特點，都是忽視對客觀實際的調查研究，不了解『中國』的具體情況，以爲憑主觀想像，憑一時的感想，……就能指揮『中國』的建設」。他又說：「滿足於一知半解，自以爲懂得很多而懶於學習，這就是對於人民缺少責任心的表現，這種錯誤態度我們是堅決反對的」。

上述各點，均是劉匪對毛澤東的深刻指責，在毛匪看來，這對他的政治前途實是莫大打擊，於是不能不積極部署，對劉少奇予以反擊，以至毛劉由分裂又進一步轉爲鬥爭，釀成今天互相火拼的局面。

貳 林彪崛起與毛劉鬥爭

在這次毛匪澤東與劉匪少奇的鬥爭中，林彪突然挺身而出，充任打手，攀附毛匪鬥爭劉匪少奇，雖係林匪投機，企圖脫穎而出，但其與劉匪早年積有宿怨，伺機報復，實爲其主要關鍵所繫。

從共匪內部歷年鬥爭史實的紀錄中，我們對劉少奇與林彪之間的不愉快事件，至少有兩次發現。

第一次是在抗戰勝利後不久，共匪決定進軍東北建立所謂「根據地」時，當時已確定由彭匪眞（劉匪少奇之嫡系）任「東北局」書記，林彪任「

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權力鬥爭

東北民主聯軍」司令員。但對「東北民主聯軍政治委員」一職，當時毛匪澤東屬意由林匪兼任，其時劉少奇雖并未正面反對毛澤東之意見，惟其即時提出：「東聯政委」一職，是否根據一九四二年九月「中央關於領導一元化」的決定精神，由「東北局」書記彭眞兼任，以便於黨政軍一元化領導。但當時毛匪對林彪過份寵信和倚爲心腹，并未爲其所動，結果仍將「東北民主聯軍」政委一職，裁定由林匪兼任。劉匪少奇的獻辭，雖然未爲毛匪採納，亦未能打擊林彪，但林匪已是懷恨在心，祇是當時的地位遠在劉匪少奇之下，因之只有敢怒而不敢言。此後林匪與劉匪歧見日深，積不相容，實係種因於此。

不久，彭眞與林彪先後到達東北，匪黨「東北局」成立後，彭眞未將工作重心放在農村，而置於城市，使「東北民主聯軍」兵源發生嚴重缺乏，適予林彪以可乘之機，因運用當時「東北局」副書記高崗，不斷向匪黨中央提出：「東北工作應立即深入農村、發動羣衆、展開土改、擴充兵源」（其時高崗如此行動，并非純爲林彪利用，實是因他未到東北之前，幕後曾與彭眞爭奪「東北局」書記，惟彭得劉少奇之助而告勝利，高崗是在報一箭之仇而已）。果然一計生效，毛酋乃將彭眞調離東北，林彪遂取代其出任匪黨「東北局」書記，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成爲「東北王」。林彪之得勢，對劉匪少奇實是莫大刺激。

第二次是劉匪少奇利用「高、饒反黨聯盟」事件打擊林彪。一九四九年匪僞僭立政權後，高崗即出任僞「東北人民政府」主席，他自持盤據陝北，對匪黨的叛亂有功，因而利用職權，大事培養個人勢力，自樹「獨立王國」，高崗不滿劉少奇周恩來之坐享高位，於是「以根據地的黨」（赤區的黨）的代表者自居，聯合饒漱石及一般高級匪酋，同劉少奇爭奪黨的總書記，同周恩來爭奪僞政務院總理，向毛劉的領導核心進攻。當時高崗提出的所謂「中國共產黨是『二元化』的黨，即是赤區黨、白區黨之分，槍桿子出政權，槍桿子出黨……」等等論調，是企圖從根本上動搖劉少奇的地位。據謂高崗如此大言不慚，是先前得到了林彪的同意和默許。此事後來由武漢鋼鐵公司黨委書記兼總經理李一清（現任匪黨中南局書記）和黃石市委第一書記楊統（現任湖北省委書記）檢舉高崗罪惡時得到證實，他們說：「高崗到武岡檢查工作時，從武漢到黃石市車中，對我們說：『赤區黨、白區黨和槍桿子出

黨、出政權」問題，林總（指林彪）也同意……。」由此可知當時林彪對高崗之反對劉少奇，不僅實際參與其事，而且是極表支持。這使劉少奇非常憤怒，因之，他一面除了施用調虎離山之計，將高崗從東北調至北平擔任偽經濟建設計劃委員會主任委員，將饒漱石調離華東區出任匪黨組織部長，分別監視，使其喪失行動自由，并以秘密審判方式、使高、饒認罪，承認「反黨聯盟」，將其整肅外，同時對林彪縱不「包庇敵人」，也有「知情不報」之嫌，亦擬加以懲處，以肅黨紀，後來雖由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從中斡旋，和毛澤東之愛護，得免於難，但林彪卒因受其影響，乃被冷藏一個相當時期。這一大仇大恨，林彪經年累月耿耿於懷，非向劉少奇報復，絕不甘心。

由上述兩項事實看來，今天林彪甘於出面充任打手，全力支持毛匪澤東打擊劉匪少奇，是有其前因後果，并非偶然。

事實上，毛匪與林匪之攜手，並不是自今日始。共匪向西流竄，「遵義會議」以後，匪軍經四川擬進入甘肅，林彪被任陝甘支隊副司令（司令為彭匪德懷），毛匪出任該支隊政委。林彪的這點武裝力量，竟成爲毛匪嫡系部隊。一九三五年，林匪首先在陝北與土共劉志丹、高崗等會合，替毛匪建立了陝北的新據點。如果沒有這個據點，必成瓦解之勢，也就不會產生以後叛亂尋至竊據大陸建立匪偽政權的機會。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時，林彪任匪軍「山東軍區」司令，率部搶先進入東北，在蘇俄遠東軍區司令協助之下，收編了偽軍四十萬人，於一九四六年組成「東北民主聯軍」，一九四八年改爲匪軍「第四野戰軍」，林彪自任司令員兼政委。共匪能於一九四九年初竊踞平津，隨後渡黃河、過長江，竟於一九五〇年五月到達我國最南端的海南島，不能說不是林彪對毛匪所出的死力。共匪竊據建立偽政權後，林彪因得毛匪的提拔，乃能扶搖直上，一九五二年八月，出任匪「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一九五六年七月，匪黨舉行八屆全國代表大會，林彪被擢升爲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區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一九五九年九月，林彪接替彭德懷出任僞國防部長。從茲以後，林彪飛黃騰達，不可一世。從一九六二年起，林彪趁著劉匪少奇與毛匪澤東反目的機會，正式倒向毛匪，高唱「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通令匪軍「學習毛澤東思想」，大獲毛匪之信任。其後，毛匪在大陸匪區不斷推展所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學習解放軍運動」、「工業學大廈」

、「農業學大寨」等運動，所有這些運動都結合學習毛匪著作，貫穿毛匪思想而進行，凡此種種，林彪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林彪得勢以後，爲鞏固其在軍中的地位，乃利用僞國防部長職務，藉口「培養接班人」及「突出政治」等名義，採取下列三個階段不同的策略。

第一階段，清除「彭黃集團」，鞏固基層控制。

韓戰以後，共匪接受韓戰教訓，其建軍思想自四十三年開始依賴蘇俄的軍事援助，建立「現代化」和「正規化」的軍隊，但「現代化」與「革命化」的建軍思想無法並存，因而自四十三年起，也就使共匪在建軍工作的進程中，引起「現代化」與「革命化」兩條路線的鬥爭。前者偏重於「現代化」，特別強調「正規化」的軍事制度和學習現代軍事科學技術的重要性，主張無條件吸收蘇俄軍事制度及其建軍經驗，公開叫囂：「唯武器論」、「現代戰是技術戰」、「馬列主義不能駕飛機」、「消滅游擊習氣和山頭主義等口號，並強調軍事上的高度統一和集中。後者則強調匪軍在流竄、抗日兩次戰役所吸收的游擊經驗之「光榮傳統」，強調馬列主義的「革命精神教育」，叫囂「政治和人的作用」。彭、黃乃以倡導「現代化」的軍事思想而與「革命化」的軍事思想相對抗。

彭、黃兩匪被撤免後，林匪首先是肅清「彭黃集團」，據說整肅指標是肅清匪軍中幹部的百分之一五。其所採取的主要措施，有：

- 一、一九六〇年十月匪黨中央軍委會召開擴大會議，改組匪黨軍委會，林彪當時提出「正確處理軍隊政治工作領域中的四個關係問題」，提倡「四個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作爲匪軍的「政治工作方向」及「軍隊建設方向」。
- 二、從一九六〇年六月起，抽調嫡系幹部二十二萬九千人下放連隊、下放基層，以開展「三八作風」（「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伴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團結、緊張、嚴肅、活潑」作爲清除「彭、黃集團」基層幹部的辦法。

- 三、一九六一年元旦，匪黨軍委會號召匪軍開展「四好連隊運動」，以作爲「加強基層建設，全面提高連隊戰鬥力的根本措施」。

- 四、一九六一年七月，公佈「連隊教育管理條例」，十至十一月匪軍召

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通過「連隊黨支部工作條例」、「連隊團支部工作條例」、「連隊政治指導員工作條例」、「連隊革命軍人委員會工作條例」。五十二年二月共匪再次召開匪軍政治工作會議時，偽總政治部乃提出所謂「連隊建議的十二條基本經驗」，作為加強控制連隊的基本原則。

這些措施，完全以恢復「革命化」的傳統建軍思想為根源，清除「彭、黃集團」各級幹部，並推行軍中政治工作，鞏固連隊，控制軍隊中的基層組織。

第二階段，推廣匪軍中政治工作，向匪黨、政滲透。

一、一九六四年元旦，匪人民日報社論「乘勝前進」一文，號召各部門各地方「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強調「要把基層單位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好」，首先提出要各部門各地方「學習具有優良傳統的人民解放軍的政治工作經驗」，以當作加強政治工作的手段。

接着二月一日匪人民日報社論「全國都要學習解放軍」、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社論「把三八作風傳播到全國」、匪「中國青年報」雜誌第四期社論「共青團要大學解放軍」。此後，林匪乃有計劃地推行學習匪軍的政治運動，作為向偽政權機關滲透的起步。

二、偽政權各部門從上到下建立各級「政治工作機構」，為林匪積極滲透偽政權的表現，以對抗匪機關委會的領導與控制。這一工作，開始於一九六四年初，偽「全國商業部門改善經營管理工作會議」，已透露在商業部門建立政治工作機構的辦法。嗣後，各部門相繼效尤，各「政治工作機構」乃與匪黨機關委會展開激烈的政治鬥爭。

林匪派遣嫡系幹部任重要職務者，如許世友升偽國防部副部長兼南京軍區司令員（原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升為副總參謀長兼北京軍區司令員（原國防委員會委員）、韓先楚升為副總參謀長兼福州軍區司令員（原福州軍區司令員）、李天佑升為副總參謀長（原廣州軍區司令員）、蕭華升為總政治部主任（原為副主任）、梁必業升為總政治部副主任（原武漢軍區政治部主任）、邱會作升為總後勤部部長（原廣州軍區政委）、李聚奎升為總後勤部政委（原國防委員會委員）、張池明升為總後勤部副部長（原武漢軍區後勤部政委）、吳法憲升為空軍司令員（原空軍政委）、吳克華升為砲兵司令員（

原第四十軍軍長）、馬輝升為河北軍區司令員（原河北軍區副司令員）、陳金鈺升為山西軍區司令員（曾任四野師長）、吳瑞山升為江西軍區司令員（原第五十四軍軍長）、黃榮海升為廣東省軍區司令員（原第四十三軍軍長）、胡炳雲升為陝西軍區司令員（原福建省軍區參謀長）。最近羅瑞卿被整肅後，又升任其心腹得力助手楊成武代理總參謀長（原副總參謀長）。

其次，林彪為使其已系勢力滲入匪黨方面，因又自一九六三年起，即派其心腹幹部的匪一級軍區司令員或第二政委兼任匪黨中央局或省委書記處書記，一九六四年又開始在各黨政機構設立政治工作部門，並將大量匪軍幹部，轉任或兼任各政治工作部門之領導人員。其滲透之情況：如偽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兼任匪黨中央東北局書記處書記、偽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兼任匪黨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偽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兼任匪黨中央華東局書記處書記、偽蘭州軍區司令員張達志兼任匪黨中央西北局書記處書記、偽北京軍區第二政委廖漢生兼任匪黨中央華北局書記處書記、偽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兼任匪黨雲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偽昆明軍區第二政委李成芳兼任匪黨雲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偽原任廣州軍區後勤部政委楊樹根轉任匪黨中央財貿政治部主任、偽原任上海警備區政治部副主任王子揚轉任匪黨上海市委工業政治部副主任、偽原任第二十七軍政委陶庸轉任匪黨中央華東局財貿政治部主任、偽原任北京衛戍區政治部主任岱忠信轉任匪黨中央華北局財貿政治部主任、偽原任上海警備區第二政委秦化龍轉任匪黨中央農林政治部主任、偽原任北京軍區砲兵政委李人林轉任匪黨中央工交政治部副主任等。

同時，林彪為使已系勢力滲入偽政權機構起見，因又派遣大批幹部打入偽國務院所屬各部門工作，如介偽第十六軍政委吳融峯任偽第三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偽通信兵政治部主任王諍任偽第四機械工業部部長，偽砲兵司令員邱創成任第五機械工業部部長，偽海軍副司令員方強任偽第六機械工業部部長，偽海軍青島基地政治部主任黃忠學任偽第六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偽空軍副司令員王秉璋任偽第七機械工業部部長，偽北京軍區副參謀長羅文坊任偽水利電力部副部長，偽總後勤部參謀長青光義任偽地質部副部長，偽東海艦隊副司令員彭德清任偽交通部副部長，偽南京軍區副政委蕭望東任偽文化部副部長兼該部黨委書記，最近陸定一被整肅，蕭匪又代理文化部長，原武漢軍區政治部副主任顏金生任偽文化部副部長兼政治部主任，原福州軍區副政

委任少川任僑建築工程副部長、僑廣州軍區副司令員莊田任僑廣東省副省長等。

由於林彪近年積極部署，擴充嫡系勢力，使其得力幹部掌握軍權并滲入黨政各部門，今天他能一步登天，成爲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坐上第二把交椅，成爲毛匪的繼承人，亦是順理成章、勢所必然。

毛匪與劉少奇交惡之後，本已勢單力孤，中途得林彪之投効，乃使迴峯九轉、如虎添翼，毛匪看到劉匪厚結彭眞，以「北平市委」與「北京市府」爲大本營，樹立反毛大纛，復運用吳晗、鄧拓、廖沫沙和一羣高級文化知識份子周揚、田漢等假「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以及各種刊物大向毛匪開刀，譴責毛匪「主觀」、「憑感情辦事」、「自以爲是」、「吹牛皮」、「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不虛心等等，都是對毛匪子以致命打擊。因此，毛匪澤東乃夥同林彪，并爭取周恩來，大向劉匪進行反擊，其本人則於一九六五年秋，密赴上海部署，旋則運用匪黨地方勢力，指使上海「解放日報」總編輯姚文元撰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刊於上海「文匯報」，放出共匪「文化大革命」第一槍。接着，匪「解放軍報」起來帶頭響應，尋至對劉少奇、彭眞的「反毛派」下總攻擊令，這是林匪以「文化大革命」揭開序

幕，而以「紅衛兵」作爲奪取匪黨領導權的工具。「文化大革命」從批判「海瑞罷官」、揭發「三家村黑店」，終於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由匪黨中央解除彭眞的匪黨北京市委第一書記職務，使劉少奇喪失反毛的一員大將，隨之，劉系的匪黨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副部長周揚、林默涵、吳冷西，以及僑各省、市、區文化宣傳重要頭目，一一均遭毛匪拔除，并將匪軍總參謀長羅瑞卿整肅，派由毛、林一系心腹幹部如陶鑄出任匪黨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傳部長，楊成武代理總參謀長，康生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接着，毛匪於七月底返回北平，隨於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召開匪黨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所謂關於共匪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決定，并發表公報，使毛匪自一九六二年九月匪黨十中全會以後過去四年來所推行的政策路線得到追認，認爲「完全正確」，獲致第一回合勝利。到了八月下旬，毛匪爲要從基本上消滅反毛勢力，於是在林匪彪支持之下，弄得整個大陸天翻地覆，最近且公開對劉少奇指名攻擊，乃使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權力鬥爭，進而短兵相接，邁入新的階段。

從眞理報論「中國事件」談匪俄鬥爭

關 素 質

從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共匪第八屆中央第十一次全會公報（註一）

摘錄要點如下：

壹 全文要點

第一部份 攻擊共匪反蘇總路線

共匪公開提出反蘇反列寧主義總路線（發表後，俄共中央委員會於九月一日在眞理報發表一項公報，攻擊共匪反蘇路線，成爲匪黨公開的政策，公報中說：「久已進行反蘇運動，經過此次中共中央全會以後，藉着一種新的力量爆發開來」，十一月二十七日俄共眞理報編輯部又發表一篇文章（註二），可以說，自從黑魯甯夫上台後俄共新領導者沉默二年多以來，攻擊共匪以這篇文章爲最激烈、最重要、最嚴重；蘇俄在背後爲阻撓共匪進入聯合國，并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在聯大散發這篇文章，這篇文章全文分爲三個部份，現在

（一）反對「三個敵人」：共匪第十一次全會公報中提出反對三個敵人，帝國主義，世界反動派，及現代修正主義，爲共匪對外政策基本目標。
（二）蘇俄「第一號敵人」：共匪指責俄共聯合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和